

木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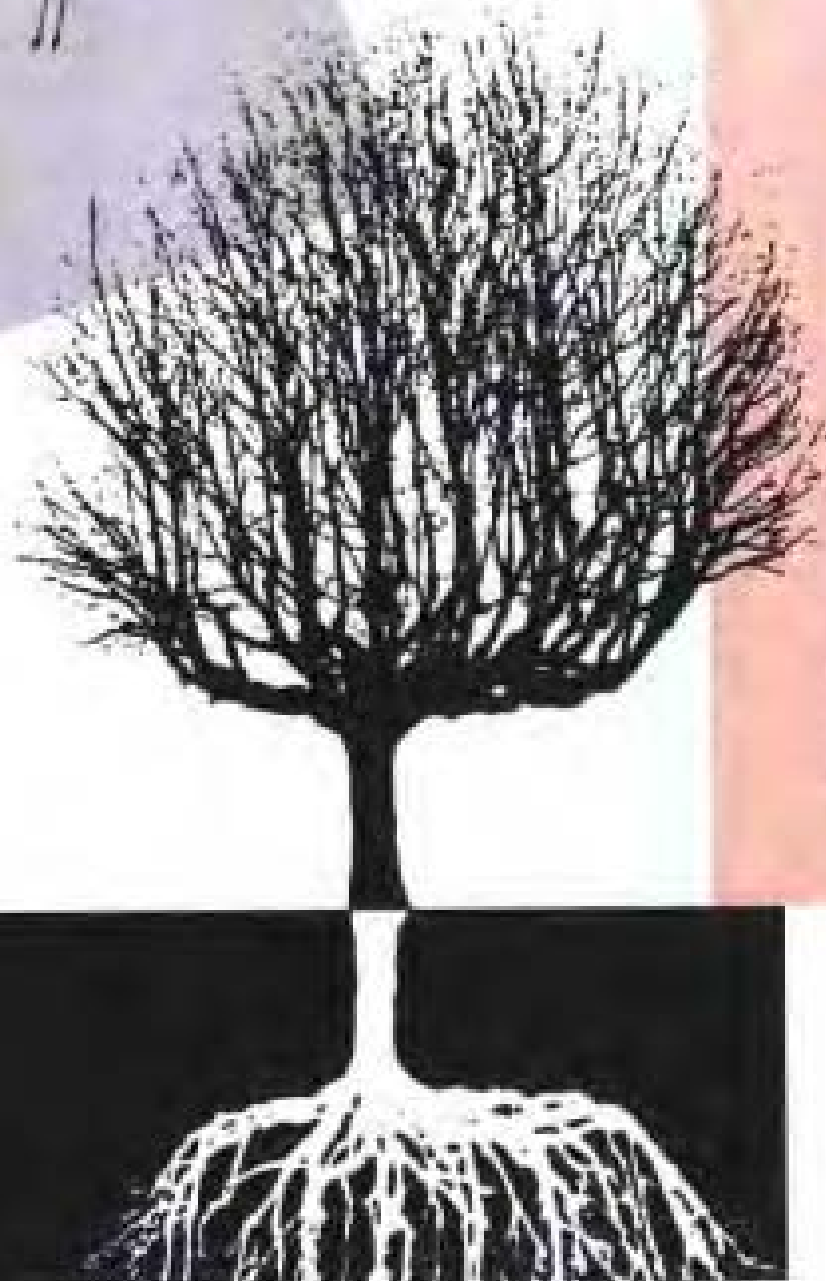
书

文化史的 视野

——黄兴涛学术自选集——

「木犁书系 / 我思文丛」

黄兴涛



【木犁书系 / 我思文丛】

触摸科学 刘 兵

思远道 陈嘉映

语言空间 张志扬

直观 赵汀阳

非我与我 王铭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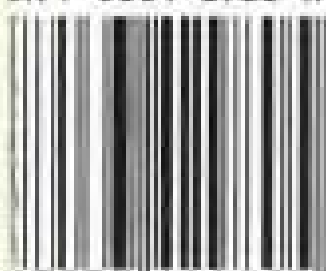
文化史的视野 黄兴涛

以科学的名义 刘华杰

文化与美学的视野交融

陶东风

ISBN 7-5334-2980-X



37533 429805 >

ISBN 7-5334-2980-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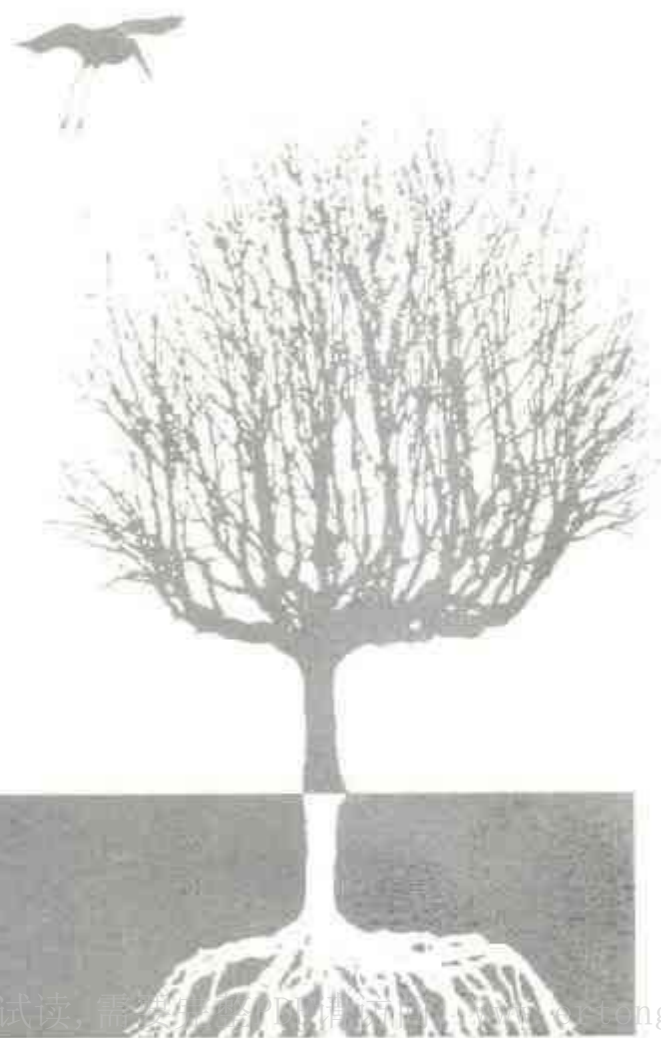
乙·60 定价：29.50元

【木犁书系 / 我思文丛】

▲——黄兴涛学术自选集▼

文化史的视野

黄兴涛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史的视野：近代文化与文化交流片论/黄兴涛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3

(木犁书系·我思文丛)

ISBN 7-5334-2980-X

I. 文… II. 黄… III. 文化史-研究-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7684 号

木犁书系

总策划 阙国虬 黄 旭

我思文丛

文化史的视野

——黄兴涛学术自选集

作 者 黄兴涛

丛书责编 黄 旭 孙汉生

本册责编 陈玉龙

封面装帧 林小平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社长兼总编辑 阙国虬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印 刷 福州 7228 工厂
(福州鼓屏路 33 号 邮编 350001)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5.25

字 数 332

插 页 4

版 次 2000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300

书 号 ISBN 7-5334-2980-X/Z·60

定 价 29.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木犁书系”缘起

20 世纪是风云际会的岁月。共和国历经五十年风风雨雨，走到了世纪的交汇点。中国新文化更是步履维艰，行行重行行，辛苦探索近百年；中西的撞击，古今的流变，还有战争和革命的淬炼，无不带着撕裂的阵痛，而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深深的辙痕。

站在世纪的交汇点上，蓦然回首风雨来时路，审视一行行曲曲折折的辙痕，望前路仍是沟沟坎坎，我们想起了木犁——这简易、笨拙而又凝重、厚实的农器，在我们的祖先歌哭其中的黄河两岸、长江流域荆棘丛生的广袤荒原上，犁出了一片片文明的处女地，从新石器时代以迄即将告别的世纪，中华文明的每一节进步，都饱含着一犁泥土的芬芳。

在这世界局势并不平静的世纪之交，我们尤其怀念木犁，怀念我们的先贤孔子师徒那段精彩的对话——孔子让诸弟子各言其志，颜回对曰：“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为农器，放牛马于源藪，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

基于这样美好的愿望，我们把正在编辑出版的几套命意相关的文丛合称为“木犁书系”。“木犁书系”首批推出的文丛有：

“野草文丛”，是一批活跃于当下文坛的杂文作家和鲁迅研究学者以读书札记、文化随笔的方式，对现今文化现象进行鲁迅式的审视和反思。

“风雨文丛”，是一批德高望重，极有影响的前辈学者（以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主）学术随笔自选集，或是对现当代文坛的风风雨雨作些梳理和反思，以鉴往知来；或是对作家、作品的评点；或是对文风、学风的思考；或是治学感怀。

“我思文丛”，选择45岁左右的最有实力的中青年人文学者90年代以来的优秀学术文章，集中展示其学术思想进路，可以预示下世纪中国学术的走向。

“苜蓿文丛”（苜蓿，旧时用来指称教馆的清苦生活），是一批教育学者心灵的散步，昭示的是源自教育使命感的闪电般发人深思的一击，有对中国现代教育命运的关注，有生命化了的教育实践的记录。教育工作者要么埋头于教学，要么潜心于专著，而此套关于教育的随笔却别开生面，以另一种方式展示了教育工作者的一份生命气蕴。

我们荣幸地邀请到当今文坛、教育界、学术界一批卓有建树的人士如邵燕祥、严家炎、吴小如、谢冕、钱理群、袁良骏、王富仁、顾明远、黄克剑、赵汀阳、陈嘉映等先生加入了我们的耕耘队伍，他们笔健如犁，辛勤耕耘，在各自的领域拓荒不止，开垦出一片片长满创意的新田地。

我们对自己的期许是，像木犁一样，一头插进生活的沃土，贴近人生，贴近教育，贴近学术文化，更贴近广大读书人，耕耘出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田园。

我们期望，当你翻开“木犁书系”的每一页，都能得到一犁泥土的芬芳。

阎国虬 黄旭

1999年

目 录

1	自叙
5	尚“通”：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
19	民国文化的时代精神论
55	近代中国汉语外来词的最新研究 ——评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
84	近代中国新名词源流漫考二则
106	“儒臣”的应变与儒学的困境 ——张之洞与晚清儒学
137	近代诸子学的学术特征与文化意蕴 ——评介《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
141	近代中国文化学史略
148	“东方文化派”及其文化模式观

188	“学衡派”主将的精神关怀 ——文化保守主义者梅光迪论
208	《近代以来文化名门世家》丛书序
212	甲午战争时期“主战”舆论三题
234	戊戌百年祭：一个近代化视角的反思
243	五四时期的废娼运动初探
258	一对特殊的朋友：胡适与李大钊关系论
280	人文景观辜鸿铭
285	辜鸿铭英译儒经论
327	《中国人的精神》译者前言
335	近代中国反基督教侵略史上的精彩一笔 ——辜鸿铭反洋教述论
349	“怪杰”之谜：一个文化现象的阐释

361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不应被遗忘的人物 ——陈季同其人其书
384	加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
390	《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译丛序
395	马戛尔尼使华与传教士和传教问题
422	张之洞《劝学篇》的西文译本
433	民国时期中国文化外播概略
461	简述民国时期国内各民族文化的新交融

自叙

马克思、恩格斯有句偏爱历史学的名言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费尔巴哈》）

记得刚进大学历史系，从富于哲人气质的史家白寿彝先生口中首次闻听此言时，心中除了有一种未明究里的疑惑，还曾涌起过一股莫名其妙的兴奋。待逐渐了解了这两位巨人的知识结构，他们对于历史科学的贡献，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在其学说中的重要地位之后，疑惑方释，兴奋也无。不过，它虽可能还不是一句完整科学的论断，却能引起我们对于史学特性的思考。

在这个史学遭受冷落的“实用”年代，选择治史，也就等于选择清苦

选择寂寞。如果说自己当初入“道”，还需要靠革命导师的“语录”来壮行，那么如今则早已是习而成性，史癖日深了。在这一过程中，我也不断感受到来自学科内部的无尽的动力，那就是历史学本身所具有的超越性的吸引——它那博大的范围，深邃的内蕴，综合的视域，浓郁的人文色彩，无不显示出一种“通学”的魅力。我想，一切事物的“历史性”、人类有机联系的整体性、自然与社会的统一性，或许正是马、恩作出上述论断的思维前提。此外，我所理解的史学“超越性”还在于：它可以使人内在地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可以跨学科地任意选择研究课题，而不会被算作“越界”，同时也有更多的机会与随时“插足历史”的人进行跨学科交流。这样一种学术“生存”状态的选择，对于吾侪来说，实不乏自得自乐可言。

在学科界线日益模糊的今天，历史学早已成为人人能“做”的公共学科，它为各种“方法”和“思想”提供着实验场。但这并非只给史学带来尴尬，同时也带给史学走向复兴的机运。尽情“消费”各门学科的知识 and 手段实不足为羞，它倒可能正是史学自身的学科特点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由于太清楚自己多方面的限制，我从未成为史学“通才”的奢望。但史学或许还有一个独特的好处，那就是上既可以成“通”，下也能不弃“庸”，只要老老实实埋头于具体问题，考证也罢，“描述”也好，总不至于腾云驾雾、自欺欺人、一无所得。历史学拒绝玄虚的实在性，也是吸引我史海漫游、史途跋涉的原因。

不过，考史研史虽属有趣，说到成绩则不免惭愧。受命编辑这本小文集时，我想得更多的不是曾怎样做和已做过什

么，而是今后该如何做。实际上，这里所收的不过是自己一点浅学的记录，适足为今后进学的起点。按丛书要求，文集选录了90年代以来自己所陆续写作的一部分论文、随笔、书评和学术札记，其中大多发表于1994年以后。因为所涉及的问题基本都是在近代中国文化史的范围之内，故名之为《文化史的视野》。

毋庸讳言，我的“文化史视野”既不够深邃也还不够广阔，只是对近代中国文化的时代精神，学术与文化思潮，中外文化交流与新名词等几个方面的具体问题作了一点粗略的探讨。当然也涉及到对辜鸿铭、陈季同等几个很有特色的文化人的研究，这是我前些年用力较多的领域。

然而文化史的视野是应该极为广阔的。它不仅要烛照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还须透视文化与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换言之，文化史不仅是一个论域的设定，更是一种方法的选择和视角的抉取。它是要人们从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和认知历史问题。“文化决定论”诚然“贫困”，但文化因素确是无处不在，只是在具体的历史问题中，其所起的作用程度有别、各不相同而已。因此，“文化”永远是人们认识历史所不可或缺的一种眼光。

文化史的视野又应是极为深邃的。它不能满足于平面扫视文化各部类支离片段的表象和各部类之间表面的“拼盘”，面应立体地窥揭各部类内部和各部类之间多层次的内在关联。只有在纵横双向的多维联系之中，才能深刻地把握历史的文化属性和文化的历史发展。没有自觉“联系”的眼界和建立“联系”的有效方法，既实现不了文化史的广度，更不可能有其深度。

最后，还需说明的是，文集中有两三篇是同龚书铎教授和李文海教授等合写的，各篇之下均已注明。除他们之外，我的学术研究还受到所在单位的戴逸教授、王思治教授等许多老师的指点和帮助，福建教育出版社的黄旭、孙汉生、陈玉龙等同志为本书的出版作了许多具体工作，特此一并致谢。

1998 年底于北京志新村小区

尚“通”： 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

“通”的观念与尚“通”精神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一个历久常新的课题。近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在学术界又掀起一个小高潮。人们谈得较多的是“天人合一”，在这一命题之下，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精神阐发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不过笔者认为，用“天人合一”的命题来概括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似不如用尚“通”来概括更进一步。用尚“通”来概括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明确涵盖人与自然、人与人两个维度的关系，对中国文化的种种现象做出较为宏观综合的说明。

“通”是一个有着特殊内涵的古

老概念，在《周易》里已经反复出现，《系辞传》里使用尤多，它是《周易》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综观《周易》全书所使用的“通”字，其基本含义是与“穷”、“塞”相对的“通达”、“贯通”和“畅通”。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去把握这一概念：首先，它是一种自然本体观，反映的是自然界万物（包括人类）普遍联系、构成有机整体的属性和状态，一种生生不已、无所滞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自然和谐境界，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无穷谓之通”，其中的“通”所说的就是这种状态和境界。其次，由于“通”是阴阳对立面之和谐统一的实现，矛盾的调和或暂时消解，所以，“通”就意味着“吉”和“利贞”（宜和正），《周易》里随处可见的“亨”、“元亨”、“大亨”，即是此意。亨者，通也。因此，“通”同时也是一种人类为之努力实现的社会目标或至上境界，即通过宏观整体地把握和透彻地了解自然界与人类自身（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等），以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不隔”、“不塞”的状态，也就是对天然“通”境的无限追求和不断接近。孔子从40岁起逐渐开始“不惑”、“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涵义。司马迁曾说：“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这反映了古人对于《周易》这部“通”经和孔子这个“通”人的崇敬之情。

当然，从本质上说，“通”和人类对“通”境的追求，都是没有止境的。古人视《易》为“通”经，视文王、孔子等人为“通人”，实反映了人类认识的阶段性和局限性。然而，《周易》的创作者的确是以敏锐的眼光洞察到宇宙的一

大秘密，它堪称将“天地人”彼此打“通”的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尚“通”文化最早也是最为重要的哲学成果。在《周易》诞生以后，“通”的观念在中国虽有发展，但基本涵义却并无大的变化。

不过，要完整地把握“通”的文化观念，除了以上提到的“变”的概念外，我们还要涉及到同时出现或稍晚出现的其他一些相关概念，如“一”、“圆”、“博”、“和”、“神”、“气”等等。它们与“通”组成“通一”、“圆通”、“博通”、“通和”、“神通”、“一气相通”等概念群，从而构成完整的“通”观念。“一”是“通”的外形，即一以贯之的统一体；“圆”、“博”、“和”都是“通”的状态，“圆”、“博”体现的是浑然贯通、博大无边、生生不已、无所凝滞，“和”表明的是对立而的统一、和谐、中和；“神通”是“通”的最高境界，“气”则是“通”得以实现的媒介物。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和”的概念，它对理解中国文化精神颇有帮助。但“和”既是“通”的状态，又是“通”的结果，反过来说，“通”既是“和”，又是所以“和”，显示出一种纵横双向的动态发展。

尚“通”的文化精神，在中国人的人格理想和学术追求上得到了集中体现。就人格理想来说，中国古人推崇的是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通人”、“通才”。儒家强调“儒者通天地人”，“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因而最鄙视“一孔之陋儒”，最敬佩知行无碍的“通儒”。孔子本人就反对士人究心“小道”，成为“专家”，而主张“君子不器”，鼓励士人成为通晓人情物理、天命人事从而能够“治国平天下”的通才，即荀子所谓“通士”。

道家的人生境界也是“通”。老子说：“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① 庄子说：“道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通者，得也，适得而已矣”^②。他们渴望的是“通玄达妙”。全真道华山派创始人就取法名“大通”，称“郝大通”，后赐“广宁通玄太古真人”。中国的佛教也尚“通”，禅宗北宗的创始人神秀和尚，死后便谥“大通禅师”。所谓“禅”，所谓“悟”，都极尽尚“通”之神。实际上，在中国，修行高超的道士与僧人，自命或他称为“圆通”、“智通”大师者，可谓比比皆是。

与尚“通”的人格理想相一致，中国古人在学术上也追求“通”境，崇尚一种无所不包的“通学”。因此，像经学、史学这类被认为能够治国平天下的大学问格外发达。经学的目的是“通经”，几千年来，汗牛充栋的经学著作中，以“通论”、“通义”、“通解”、“通诂”、“通说”、“会通”命名的层出不穷。古代史学更能反映尚“通”精神，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便是对这一学术精神的绝妙注脚。在编纂体例上，中国史家也更重视写“通史”。举凡《通志》、《通典》、《文献通考》、《清三通》、《续三通》等，都是以“通”为名的史学名著。对于中国文人学士来说，最怕的评价就是自己的著作被认为“不通”，最高的评价之一则是“平正通达”。于此可见中国古代文化尚“通”精神之一斑。

① 《老子·十五章》。

② 《庄子·齐物论》。